

西迁“半边天”——西迁巾帼群体历史考察

杨澜涛

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20世纪50年代,在交通大学西迁创业的广大群体中,妇女群体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她们听党指挥跟党走,奋斗于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以及家庭建设等多条战线,为西迁伟业的创造和西迁精神的熔铸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本文所提西迁巾帼主指20世纪50年代参与交大西迁支援祖国西北建设的广大妇女,包括教师队伍、管理队伍、教学辅助队伍和家属队伍中的女性。本研究通过梳理西迁女性群体的成长与奋斗史料,为增进理解西迁历史和西迁精神提供别样视角。

一、交大西迁创业中的巾帼力量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是新中

国成立之初一个响亮的时代主题。

1955年3月21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审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决议提出:“五年基本建设计划,对地区的分布作了比较合理的部署,这就是:一方面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工业建设。根据这样的方针,五年内开始建设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的将有472个”。根据决议精神,新中国建设形成了以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北京、武汉大冶、包头三个区域;以电器、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西安区域;以煤矿和采矿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

大同区域,以及以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成都区域等八大工业中心。武汉、太原、西安、包头和兰州等城市成为全国工业建设的重点。

为了统筹推进西部地区工业、经济、文化、金融事业的全面建设,中共中央从区域均衡发展的方针出发,从沿海城市抽调了金融、建筑、纺织等各行业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数十万人,支援西部,汇聚成了支援西北建设的西迁洪流。1954年6月建工部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沿海城市支援重点城市建设,李富春指示:“全国各城市要相互援助,本钱大、任务少的城市应挺身而出,支援本钱小工业任务大的城市”,“华东支援西北,华东很慷慨,已经包下洛阳的任务,仍需包西安、兰州两个城市”。会后,“中央动员了全国50多个城市、近千个企业,对重点城市进行了大力支援……”^[1]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呈报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内称:“根据我部和中央各有关业务部门初步商定,将南京航空专科学校迁至西北西安附近成立西北航空学院;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具体地点和陕西省委商定),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2]报告涉及西迁高校共计十三所,交通大学,华东航空学院是其中全迁单位。经副总理陈毅、陈云审阅后提请朱德、刘少奇、彭真和邓小平圈阅,后退由周恩来审阅,经过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审议,由毛泽东签发通报全国。1955年7月21日高等教育部正式下发《关于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通知》。高教部指示,交大迁校后发展按“最大建设规模为12500人”(迁校前师生近7000),为国内当时规模最大高校;迁校

于1955年建设,1956年确保在西安新校开班授课。根据1955年11月24日《交通大学迁校方案》显示,交大西迁共涉及“教师632人、学生2812人、职员390人、工人450人”,迁移人数近4300人^[3],迁移家庭1000个左右。要在两年内完成整建制(包括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实习工厂、后勤、家庭家属等)的搬迁,30余万教学科研基建用房,且不影响学校办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西北工业建设及科研需求等,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高教部的实际领导下,沪陕两地党委大力支持,交通大学于1956年9月10日正式在西安举行开学典礼,于1959年7月31日正式定名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使命圆满完成。此时“全校现设机械制造等8个系,32个专业”,“在校学生9400多人,是解放初的4倍;教师人数是解放初的5倍;校舍31万平方米,是解放初的6倍;实验室50多个,是解放初的8倍;图书52万册,是解放初的6倍多。”^[4]1962年,受高教部委托,西安交大起草上报了《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暂行条例》,并在“1963-1972年国家科学技术十年规划”(包括32个规划、120个中心问题中的257个课题)中,负责了9个中心问题、68个研究课题。^[5]经高教部批准,20世纪六十年代成立了作为全国高校科研骨干的金属材料及强度、电气绝缘研究室,筹建工程热物理研究室和国家科委直属的振动力学测试基点(上述4个研究室,是学校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基础)。学校在1959年被党中央指定为全国十六所重点建设大学之一。1981年4月,西安交大西迁25周年纪念大会举行,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称赞:“西安交大多年来经过全体师生的辛

勤劳动,大学本科质量不断提高,曾达到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6]

党员干部是西迁创业完成的核心和骨干力量。据统计,1955年学校处级以上干部总计30人,男女各15人。分布在组织科、宣教科、人事科、各党总支等多个系统。^[7]女性干部,多为解放前参加革命,如市委常委、团委书记吴镇东(1946年入党),党委委员、组织部长王宣(1938年入党),学生科长王敏颐(1940年入党),教材供应科科长虹林(1938年入党),图书馆副馆长王涟(1938年入党),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章静(1948年入党),财务科副科长段淑琴(1946年入党)……1952年前后,为建设交大党组织,华东局从华东革命大学、华东局党校等系统调入交大一批革命干部(包含部分女性),分布于学校行政系统各个部分,成为学校搬迁建设和创业的重要骨干。在西迁创业中,学校党委十分注重发展和培养女性党员,据统计,1959年6月全校党员有1161人,其中女党员237人^[8],在一所工科大学中这一数据十分亮眼。

教师是西迁创业的真正主体。根据1959年8月统计,全校教师总计1342人,其中女性教师185人,占13.79%。^[9]女教师中以青年助教为主,讲师以上人员20%左右。这其中包括三位副教授:参加中国第一代计算机104机研制任务的电讯专家于怡元,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绝缘材料专家刘耀南和电工学专家袁旦庆。

青年教师中后来作出突出贡献的有:中国人口学专家朱楚珠(曾荣获中华人口奖)、压缩机专家熊则男(多次荣获国家部委科技奖励,1986年获得萨格勒布国际博览会发明协会金奖)、863计划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专家林志航等,另

有张良莹、刘静华、黄幼玲、茅素芬等多人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顾骏声、叶德旋、盛剑霓、蒋潞、刘桂玉等多位教师荣获国家和陕西省优秀教师荣誉。

学校西迁恰逢“向科学进军”战略推进之际,交大承担了国家委托的20余个新专业的建设任务,一批青年女教师担当大任,如屠善洁(固体物理)、黄德琇(放射化学)、穆霞英(工程力学)、傅君眉(无线电技术)、王桂芹(工业电子学)、黄艾香(应用数学)、曹婉真(无线电元器件)等,成为相关专业的佼佼者。在新专业较为集中的无线电工程系(女教师有15人,占20.3%)、工程物理系(女教师有16人,占17.8%),女教师的比重要高于其他系。

中小幼和后勤保障系统女性居多,她们为整个教学科研事业的稳定开进,作出不容忽视的贡献。如曹蔚清(1979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高景孟(1980年代两次荣获陕西省三八红旗手)等。在工会的组织下,一批教授夫人如吴文华、卞秀琴、张宝云等主动承担起了家属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此外,还有一大批为了支持西迁,而放弃华东地区优越工作条件,调入西安市普通工作岗位者,如胃肠镜专家黄宗心、妇产科专家董宝芹(林巧稚教授的研究生)、通讯技术及信号处理有重大贡献专家冯若渠(1983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

二、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群体的西迁巾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儿女实现的开天辟地的伟大壮举,为历经旧社会重重磨难的每个个体、家庭注入了坚不可摧的强心剂,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国民经济五年建设计划

的实施和“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让人民群众更加坚定了对人民当家作主美好生活的期待和为此奋斗的信念。“参军参干”,参加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参加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祖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是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导风尚,社会生产各领域的一大批杰出的女性劳动模范涌现而出。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代表,是奉献报国女性群体的典型。应党中央“建设大西北”战略部署,她们不甘落后、开放进取,奋不顾身投入支援西北建设的巨大洪流,用数十年的坚守创新、无私奉献不仅成就了家和事业兴和西北文化经济大发展,也是西迁群体中一道靓丽风景线,也是最美创业群体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遍览西迁巾帼史料,西迁巾帼群体具有以下特点:

1.生于富庶之地,较早接受新文化、有独立思想。西迁巾帼多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开明地主、职员或中小资产阶级家庭。出生地以华东地区(特别是江浙沪一带)为主,多在沿江沿海口岸接受新式中小学教育,较早接触了新文化、新思想。受环境影响,她们视野相对宽阔,思想相对开放、包容,个性相对独立,勇于接受新事物,追求新生活,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这些特点在绝大多数西迁巾帼群体身上都有体现,不论任教交大的女教师和解放前加入共产党的女干部,即使一般的随迁家属也是如此。如曹蔚清(西迁教授庄懋年之妻,任交大附中副校长)、何友冰(西迁教授吴励坚之妻,交大附中普通教师)在资料中详细回顾了西迁之前各自辗转多地的读书“进取”经历。一方面在学业上,她们顽强不屈,克服自然、社会等客观不利因素,努力完成高等教育学业。如曹蔚清,边工作边读书,8年才艰难完成大学学

业。一方面,她们追求进步,在中学起即主动接受抗战、民主思想文化,参与社会民主运动。如何友冰在福州中学读书期间即参加“小小剧团”,在乡间演出抗日话剧,传唱《救亡进行曲》等革命歌曲;此外,她们还努力完成学业之时,还把家庭重担扛在身上,支持姊妹读书进步。

2.历经民族苦难,具有明确的民主革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担当。西迁巾帼中年龄最长者出生于1909年(吴文华),年纪最轻者生于1939年(潘德慈),大多数出生于1917年至1935年之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她们共同的经历,民族的悲惨遭遇和家境的诸多变故是她们一生永远无法抹掉的记忆,也是她们勇敢走出家门,积极服务社会,自强不息,争取上进,寻求救国自强之路的重要原动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屠戮,她们虽不免有些恐惧,但没有逃避苟延残喘,而是积极寻求救亡道路,并最终走向以科学技术强身,救国救民的道路。如参加过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研制工作的于怡元教授,即为学习无线电科学技术,于1940年考入交通大学。抗战的胜利未能换来中国真正的独立,反而令民众置身于水深火热的沉痛社会现实,让她们深刻认识到,反抗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黑暗统治和为民主独立国家斗争是每个人的强烈使命。虽为女性,但民主、革命精神与实践毫不逊色于男士,她们自觉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白色统治区的民主革命运动,成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力量。如西迁时任教学法科科长屠善洁,她于1947年加入青年会(地下党的围绕组织),并参加了反抗国民党的系列民主运动。在此过程中,她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从而坚定了听党指挥跟党走的政治方向。

3.接受系统新式教育,具有较高文化知识和业务素养。高等学校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集聚地,即使在管理、服务等领域,西迁巾帼也多为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就此而言,西迁巾帼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群体。巾帼创业史料可印证这一点,即使身处于旧时代,她们大都接受过相对系统的新式教育。教师自不必说,解放前入职者大多毕业于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这些学校是解放前国内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重镇,毕业生的业务知识和专业素养可谓国内一流。解放后入职者新增了中国人大、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等国内重点高校。其中多位是20世纪五十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如俞察(1955年中国人大研究生)、刘静华(1956年哈尔滨工大研究生)、吴南屏(1956年交大研究生)、袁梅珍(1957年清华研究生)、李光琦(1957年交大研究生)、宋雅苑(1957年中国人大研究生);另有多位教师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赴苏联从事尖端专业技术学习进修,如张端、曹婉真、屠善洁、王桂芹、孙漪等。就管理水平、业务素养而言,党政管理和实验室技术部门干部也各有专长。如组织部长王宣,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中央党校学习、马列学院等学习深造,并在东北教育部历练。财务科段淑琴(曾在华东公安部担任会计工作)、龚宝珣(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王柔春(毕业于无锡会计专科学校);中小学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也多为大学或相关专业专科毕业,业务水平更是代表了江浙一带优秀标准。如附中副校长曹蔚清(1956年荣获江苏省优秀教师)、教导主任熊淑薇(1959年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全国教育群英会)、附小余

又君(曾获上海市优秀讲师称号)等。

西迁巾帼生于江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启蒙成长于代物阜民丰、思想开放的沿海沿江口岸,接受了新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思想。国家备受欺凌、家庭中道破落、个人生活艰辛尊严缺失,是她们挥之不去的青春记忆。在救国图存的民主革命大潮中,她们萌发了初步的社会共同体意识与社会参与感,完成了系统的专业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们明确了建设新家园,必须建设新中国的奋斗道路。

三、舍小家、为大家是西迁巾帼群体价值的新标度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作为西迁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迁巾帼群体为西迁及创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在学校、在家庭,还是社会上,她们用特有的担当与作为诠释了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半边天”风采,她们以服务国家需要为切要,以家庭建设为基础,以个人立业奉献为核心承载,把国、家和个人三者有机融为社会主义建设大集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以“人口生产”来标度妇女价值的历史,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巾帼群体价值的精神新标度。这种新标度,可从下列三个维度来理解。

1.家国精神。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妇女解放与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存在表里关系,妇女解放在根本上服务于中华民族解放。这一逻辑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始终,甚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只是阶段不同,各有侧重,但国家和民族或

彰或隐都是基础和前提。这种关系可以用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辩证法来理解。诚如许多学者所言,解放前的女性解放选择的是“破家立国”之路,希望走出家庭(封建纲常或家庭伦理)之牢笼;西迁巾帼的解放则截然不同,她们实践的是“立国由家”“佑家强国”之路,此即我们常说的“舍小家,为大家”。“小家”之舍,绝非舍弃不顾,而是居于价值之次位,具体建设之基础。“大家”之为,是价值之主位,根本服务之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迁巾帼进一步走出家门,服务于新中国、新社会建设,争当行业能手,争做劳动模范,在西北大开发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不仅成就了巾帼的主体价值,也服务了国家发展。家庭建设,无论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夫妻爱情,还是相夫教子、孝老育幼、维系亲情的家风传承,是西迁巾帼史料呈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家庭建设的主题是革命,如新社会的夫唱妇随(实为志同道合式的尊重和彼此支持,相互成就),身先示范的“行教”家风,不胜枚举。于此,“小家”与“大家”之建设,真正实现了情感、实践上统一。这一点也在国内学者也有共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集中领导和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公与私、社会与家庭、国家与社会具有高度一体化的特点”。

2. 创业精神。创业精神是新中国女性群体精神价值的核心所在,也是区别于旧社会女性价值的关键。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之有别于动物的本质是劳动,与高级类人动物的活动不同,人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任何时代女性的解放绝非纯粹的文学艺术或政治倡导的自由与平等,经济的独立等之类的口号或形式符号,而是革命的具体的实践,后者才是妇女解放独立的真正

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0]社会角色的重构是西迁巾帼群体所有角色中的首要,而核心就是创业,是做一个革命的螺丝钉或一块砖,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这种精神是西迁巾帼克服重重艰难,在艰苦的大西北立下一番伟大事业的共同精神动力,而该群体所独具的独立进取、开放包容和相对系统知识素养及业务技能则是其必要的文化基础。在巾帼史料中,可以清晰地见证这一点,搬迁所致的职业变动和条件弱化,根本没有阻挡她们的创业热情,即使家中主妇,也甘愿在西迁家属环境中做一点利于稳定学校和团结发展的事。西迁巾帼们的自立敬业、严谨精致、进取立业的精神,成就了建国成立以来最美的奋斗者集体荣誉——“西迁人”,她们无愧于新中国女性的典范。

3. 奉献精神。奉献精神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新中国女性精神的宝贵传承。正如劳动有体力与脑力之别一样,同样也有男女之别,这是自然进化之理,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男女生理、心理和身体等各方面的差异,影响到了性别之间在社会、家庭、事业的作用定位之分殊,但正如革命事业无贵贱,只是分工不同,性别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亦如此。“男性以社会为主,妇女以家庭为主”虽是约定俗成,如建国后大政方针中倡导妇女“当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后勤兵,精心培育革命的后代,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好婚姻家庭关

系”。但此并未影响到西迁巾帼的自立创业和社会贡献,反而激励她们为家庭建设、为男性创业等作出的非同一般的奉献。这种奉献者的角色不仅深刻影响了子女发展,同时更得到了家庭之男性的赞同,认为女性才是西迁及家庭建设的最大贡献者。巾帼群体之社会身份和私人身份在此实现了一体化。这一点在巾帼史料中有诸多体现,在西迁人创业的重大节点,巾帼们的包容、坚韧、刚强、执著个性,使她们发挥了重要的有机粘合剂和完美保障者的角色,不仅成就了爱人及自己的事业,而且维护了和谐温馨的家庭,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

西迁巾帼精神形成于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以及个人价值贡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今日,重温和弘扬西迁巾帼精神同样意义深远,不论对于今日纠偏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诸多问题,还是重塑新时代新女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 [1]陈夕,董志凯:《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 [2]《西迁纪念册》,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3页。
- [3]因1957年国家战略调整,交大迁校方案中间有调整,1958年暑假最后一批迁校员工才到西安。此间尚有大批沿海毕业生来西北支援,实际内迁人数远大于此。

- [4]《交通大学(西安)年谱》,第688页。
- [5]《西安交通大学校史(1959-1996)》,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 [6]《西迁纪念册》,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 [7]《干部统计》,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 XAJD-1955-DZ15-Y-6.0012。
- [8]《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统计报表(下半年)》,西安交通大学档案, XAJD-1959-DZ11-Y-52.0005。
- [9]《1959年8月份人员统计表》,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 XAJD-1959-DZ11-Y-66.0005。
- [10]《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作者

杨澜涛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